

企业家政商焦虑症沉疴待治

游走在市场和政府之间,企业家的感受充满焦虑。有企业家说自己是人人得而烹之的“唐僧肉”,而柳传志也曾无奈地痛斥有些官员“令人发指”,并对富人移民海外做出解释:“环境真不好了,可能就得选择离开。要理解企业家移民海外的苦衷,不应太怪罪。”

李岷

“凡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,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,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,政府都要退出。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,一律不设前置审批。”新的“两个凡是”显示,在压缩权力寻租空间、增加权力使用透明度的改革之路上,中国即将进入深水区。未来,政府如何对自身动刀放血进行手术,如何主动割裂政商之间的畸形关系,是值得人们深思和期待的。

企业家的牢骚:

**中国企业
不过是政府手里的棋子**

半年前采访陈总时,他关于实体企业不好经营的感慨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。当时,他的化工企业已经停工小半年,并希望把自己的企业售出。近日偶遇与陈总相识的人,却惊闻他的企业已经进入破产程序。

总觉得不可思议。陈总的企业最辉煌时,年销售额达10亿元,是当地首屈一指的纳税大户;而且从现有的资料看,仅仅三四年前,他本人还集万千宠爱于一身,头顶着各种光环游走在摄影灯下。怎么现在一切如黄粱美梦般不复存在了呢?记者感慨沧海桑田、世事无常之际,陈总身边的人一语中的:“还不是因为和当地政府闹掰了。”

在同行纷纷以规模换市场迅猛



王利博制图

发展之际,陈总也曾踌躇满志,向当地政府申报了一个扩大产能的二期项目,得到了政府的初步认可。由于投资巨大,他千辛万苦引进一个大财团来做合作伙伴。没想到项目谈成了,陈总的企业却被迫边缘化,项目整个落进了陈总引来的合作伙伴手里。

凭着多年的积累,陈总在当地是有些关系的,但架不住对方的来头更大,最后,地方政府的态度也一边倒地向着对方。

鉴于陈总的前期投入有一定数额,多方协商后同意补偿他五千万,美其名曰“二期项目的购买费”。但补偿费要过来谈何容易!他不能开罪地方政府,而地方政府不愿得罪大财团,要来要去,这五千万补偿费如泡沫般渐渐破灭。

忙活多时一无所获,陈总大病一场,在北京做了心脏搭桥手术。回去后,心灰意冷、斗志尽丧,自己这家企业再无心经营下去。

有段时间,不管见谁,他都明确奉劝别人不要经营实体企业。他固执地认为,企业不过是政府手里的棋子,让你生你就生,让你亡你就亡,命运实在是无法自己掌控。

客观地讲,陈总的企业难以为继原因是多方面的,金融危机下销售市场的凋敝、行业竞争的残酷等等,都令他步履蹒跚。但遭受了当地政府的出尔反尔以及冷遇之后,同银行、税务等职权部门的关系一直不理不睬,却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身心俱疲的陈总选择了逃避、隐遁,干脆跳出三界外,不做江湖人不

揽江湖事,希望落个心静。然而事情远没有结束。

由于企业停工停产,工人的工资几个月发不下来,成批的职工围堵交通要道希望引起政府注意,最后,看复工无望,厂里能撬了拿走的都被职工们拿走卖了,厂子只剩下一个空壳。

看着空荡荡的厂区,陈总自己心里真是五味杂陈。

学者的感叹:

**中国企业
背负太多非市场负担**

游走在市场和政府之间,企业的感受可能并不如外表显现的那么自如和风光。有企业说自己是政客的“提款机”,也有企业说自己是人人得而烹之的“唐僧肉”。

据美国《财富》杂志报道,美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到7年,大企业平均寿命不足40年;一般的跨国公司平均寿命为10—12年;世界500强企业平均寿命为40—42年;日本《日经实业》的调查显示,日本企业平均寿命为30年;国内数据表明,中国大型企业(集团公司)的平均寿命约为7—8年,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足3年。

此类调查年年都有版本,年年都是中国企业垫底。学者们纷纷立足各种因素来解读其中的原因,譬如企业治理结构不科学、缺少成功的企业文化氛围、缺少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运用、企业财务管理存在问题以及社会的经济结构不完善、政府的经济政

策波动大、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等等。当然,也有学者在博客中对大家自觉不自觉失声的一面,展开了毫不客气的剖析:除了市场因素,中国企业背负的非市场性负担是不是太多?

学者隐晦提到的非市场性负担,应该指的是中国企业不得不依赖于职权部门、不得不受制于职权部门的客观存在。毋庸置疑,中国的现有经济体制是从计划经济时代延续下来的,至今还摆脱不掉计划经济的影子和影响,政府部门目前掌握着重要的资源,对经济活动享有巨大的支配权。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,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,一些官员手中一旦拥有权力就开始想方设法寻租权力。

难怪一些企业家口无遮拦地抱怨:在政府和职能部门面前,自己就是小娘养的,甚至连小娘养的都不是。有时自以为能掌控命运,但实际上只不过是权力结构中的一枚棋子。而一旦过了河,甚至连棋子的属性也没有了。

学者赵曾海直言,权和钱想来是形影不离的两兄弟。俗话说,有权就有钱,有钱也就有了权。处于两者关系中的官员和企业家,前者手握公共权力,能左右社会稀缺资源的分配;后者拥有物质财富,能满足人的物质欲望。因此,权和钱的交易在监督制度不健全的社会中必然大规模地存在。

虽然商人依附权力图谋发展可谓古有之,但不管是历史积淀还是利益互换使然,政商纠结的现象在现代工业社会却是不得不破的坚冰。

人无意也无力承担起推动社会良性演进的道义与历史责任。

很多案例中,当企业家冒险突进的时候,他本人知道这将是一次无比凶险的“大跃进”,不符合一家企业正常成长的逻辑。但有政商关系支撑,在特权思想的鼓舞下,他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,也认为自己应该无所不能。不过,商业终归是一场有节制的游戏,任何超出能力极限的欲望,必将引发可怕的后果。正所谓“在江湖上混,早晚是要还的”。

学者赵曾海表示,抛开此种致富方法的风险和成本不说,随着经济转型的完成和法律体系的完善,关系资源终究不能成为支持企业家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力量。违背了商业的基本逻辑,忽视了经营管理最基本的原则,失去了对管理本质的把握,许多企业家最后的沉沦其实是一个“理所当然”的结局。

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一直大力倡导“好的市场经济”,言下之意,当下的市场经济是不好的,实质是“权贵市场经济”。但不管市场模式如何,不可否认的是,国家正力争从政府层面变革目前的现状。此时,只有企业家自觉地调整价值观与行为模式,政商之间的畸形关系才有可能真正改变。

■ 亲近政府,远离政治

万科王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然地说:“我从不行贿,也不希望商界流行此道,使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由此蒙羞。”这番话让那些为“行贿”鼓

声音



姜汝祥 为客户创造价值
(国内著名企业战略专家)

德鲁克讲用人时,有着明确的标准,那就是客户价值。他强调人的优点与缺点只有一个标准,那就是是否能为客户创造价值。至于老板或上司喜不喜欢,那并不重要。

谢德荪 三星的“流创新”的借鉴意义
(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终身教授)

三星没有像苹果那样拥有革命性的新产品,但它的产业组合及商业模型使它不只直接享受到苹果式的成功,而且能把苹果的成功引为自身的创新推动力。这与中国太极学说相似,也比较容易被中国企业理解及仿效。但仿效的重点不是抄袭三星电子公司的产业组合及商业模型,而是以自身的核心能力为支点,考虑如何找寻及把握机会,进入适当产业,而通过产业组合及商业模型,建立一个两面市场商业模型来推动“流创新”的新理念。

黄鸣 保持简单人际关系和纯净学习态度
(皇明太阳能董事长)

皇明的今天,离不开早期的那些员工。可能在今天看来,当初的那批员工学历不高,其中有中专学历已属不易。但就是他们,构成了皇明早期团队的雏形,而且开创了学习精神。现在,皇明集团内各子公司的把手,很多来自早期的这个团队,我也见证了这些把手当初如何刻苦学习、如何务实地与企业保持同步发展。这些当初学历不高、能力一般的团队成员,为什么今天变得这么厉害?

皇明的员工都知道,皇明最讲求的是简单的人际关系和纯净的学习态度。作为董事长,我必须每时每刻保障这一企业文化的生存。

李开复 我为陈天桥们代言
(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)

中国概念在美国人眼里永远是个谜,有时它是一个美丽的气泡,有时它是一堆垃圾,经过两年多的挣扎,准备赴美上市和已在美上市的公司到了重新定义“概念”的时刻。

姜洪军 谷歌陷入创新窘境
(《中国计算机报》副总编)

《创新者的窘境》一书的作者克莱顿·克里斯坦森认为,尽管企业管理者可能认为是他们在控制企业内部的资本流向,但实际上真正决定资金如何花费的是投资者,因为投资模式无法达到投资者要求的企业将难以继续。如果投资者的观念没有跟上技术创新的步伐,企业创新的种子便会被扼杀。

现在,谷歌成了苹果、Facebook的尾随者。谷歌似乎在步微软的后尘,在成为商业巨无霸的同时,创新的动能却逐渐消散,落入创新者的窘境而难以自拔。

甘犁 房地产商要感谢中国丈母娘
(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)

根据CHFS的数据,30岁—35岁的城镇无房男士的未婚比例为21%,而有房男士未婚比例为7.7%。买不起房成了屌丝们步入婚姻殿堂的一大拦路虎。

华生 等茅台价格降半收入分配就成功了
(著名的经济学家)

应当说从政府到社会改起来都不容易。收入分配改革不是那么简单,现在的隐性收入猖獗到这个地步,因此这项改革的触动面会非常巨大,涉及我们整个财政税收制度,从它的制度设计到监管体制都要做根本性的变革,否则什么也改变不了,分配不公现状很难改变。

向文波 我认为尊严比金钱重要
(三一重工总裁)

如果说我们受到了这种不公正的待遇(之后)忍气吞声,我认为这不是我们三一人做事的方法。所以我觉得维护中国企业和我们三一的尊严,比花一些钱我认为要更值。另外,公平、正义我认为也比利益更重要。我们都希望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能够得到公平、公正的对待。我认为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法律,所以我们是以美国方式在解决美国的问题。

阎焱 我的职业是赚钱不是让人快乐
(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CEO)

“我很简单,就是我做的这个工作,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为了让所有人都快乐,我的职业是赚钱,是赚有良心、符合法规的钱,这就是我的工作,我的工作不是让人快乐。如果我是一个相声演员,我的职业是让别人快乐的话,那我就应该做这事,但是it's not my job。”

贾康 房产税应重点针对富人
(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)

房产税的主要征收对象应是拥有豪宅或多套房的高收入人群。应当明确的是,家庭第一套住房,或者说一定家庭人均标准之下所谓第一单位的住房,是不在房产税覆盖范围内的。此外有不少人认为,第二套房是给自己买的一份商业性社会保险,这种所谓商业性社会保险,我认为也可以在政策方面给予一定宽待,针对第二套房的房产税税率也可适当降低。

深度

“关系”背后是商业精神的缺失

李岷

坊间戏言,中国企业面对职权部门,就好比购买车票的人面对黄牛党。平日里,对黄牛党深恶痛绝,一旦有需求,又盼着黄牛党能一下子从天而降。

戏言说出了不争的事实,中国企业家被权力深深困扰的同时,又不由自主地依恋权力。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

有专家表示,体制的滞后毋庸置疑是影响中国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。但除此之外,一些中国企业家面对职权所表现出的饮鸩止渴、飞蛾扑火的病态心态,也是导致其自我沉沦的重要原因。

■ “关系”扮演着重要角色

在某次企业家论坛上,有位企业家嘉宾毫无愧色地说:“在中国不行贿一事无成,我自己就行贿过。”对于这番不加掩饰的独白,全场“报以热烈的掌声”。

在一些企业家看来,打造为我所用的政商关系成了企业攫取利益的一条捷径。有人断言,无论是在过去、

“关系”资源终究不能成为支持企业家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力量。违背了商业的基本逻辑,忽视了经营管理最基本的原则,失去了对管理本质的把握,许多企业家最后的沉沦其实是一个“理所当然”的结局。

现在,还是可预见的将来,“关系”在中国企业家的成功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

事实上,政商关系中企业家表现出的“热情”源自现代商业精神的缺失。在道德断层时期成长起来的一批中国企业家,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普遍缺乏信仰,缺乏成熟的价值观,许多